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探索

特约专家 李中华

这里的三篇论文有一种共同的学术倾向,即在中国古代文学这一传统领域追求思想观念、学术视角以及论述方式的更新。具体而言,就是力图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对于长期流传的名篇佳作进行新的阐释,对于古代作家的历史身份及文学创作展开新的论说,对于传统文学批评中的重大问题作出新的探求。它们代表着一种学术创新的努力与期待。

自从“文革”的坚冰被打破,我国的古代文学及文学批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此不待言。近年来,这一学术领域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取得不少的成绩。但是,其中也存在若干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因袭前人旧说的成分加重了,而个人的独立分析与判断相对减弱了。这种因袭的延伸,便是亦步亦趋于当代某些著名学者的意见,使得不同的学术见解难以生发与讨论;二是在学术史的研究中,不少论著将重点放在发掘、复述与阐释明清诸儒——尤其是乾嘉学者的意见上,他们津津于缕列经学的陈案与故实,而缺乏当代新世纪的学术观照与文化探询;三是古代文学研究中技术化的倾向存在,人文层面的社会关怀与精神求索则有淡化的危险。

事实上,新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面临学术转型的问题。我国传统的文学史观,其主要思想资源是封建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文心雕龙》及历代诗话、词话、文人序跋中的资料等。上世纪又引进了西方的文学观念,并经历了流行思潮的“战斗洗礼”。学术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进步,不会停顿下来。因此,站在新世纪的学术文化高度对其进行新的审视与探索,便是十分必要的了。

这里刊载的三篇论文,第一篇对于陶渊明的诗《有会而作》提出了新的阐释。作者不赞成王瑶、逯钦立、袁行霈三位先生对于这首作品的理解,认为这首诗表达了“主张尊重人的生命,鄙视并捐弃虚礼”的思想主题,认为这是“陶渊明思想中至今尚未被人发掘、重视的一个亮点”。作者显然想要打破某种思维定势,从不同的心理视角切入对这一名篇重新予以解读,值得人们深思。第二篇论文试图对于南朝梁武帝萧衍的社会身份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展开论述。在南朝历史上,萧衍有着最为复杂的社会身份:他先是一名文士(“竟陵八友”之一),继而成为一名叱咤风云的将军,登基后是南朝在位最久的皇帝,在历史上他又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多种社会身份对于他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应当如何评价?这就是作者想要加以探讨并作出回答的新话题。第三篇论文涉及清代两位著名的文学家兼文学批评家,即金圣叹与李渔。文章比较了他们不同的人生道路、不同的性格为人、不同的文学观,指出金圣叹“服膺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创作理念,推崇悲剧”、“对悲剧或文学作品的悲剧性别有会心”,而李渔则“表明并不认同发愤著书,宣扬‘唯我填词不卖愁’,极力肯定喜剧创作”,甚至认为自己的诗文作品“可作谈笑之资”。这无疑深化了对这一论题的认识。

上述论文中所提出的新解、新说、新探并非定论,希望能引起学界的重视,并展开不同意见的交流,以共同促进学术的繁荣与进步。